

当代学者人文论丛

# 听音

# 寻路者

TINGYIN

XUNLUZHE



## ——王朔论

吕晓英 著

王朔从80年代中期崛起，继而大红大紫，王朔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如飓风一次又一次地横扫中国文坛、影坛和电视界，其影响远远超出审美与艺术领域而播散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，制造了一个几家喻户晓的个人成功的个案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

# 听音寻路者——王朔论

吕晓英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音寻路者——王朔论/吕晓英著. -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5.2

(当代学者人文论丛/陈星主编)

ISBN 7-5034-1611-4

I. 听… II. 吕… III. 王朔—作品—文学研究 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1600 号

## 听音寻路者:王朔论

责任编辑:刘剑 封面设计:福瑞来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电 话:81528114(编辑部) 66480209(发行部)

印 刷: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:101109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6

字 数:167 千字

印 数:1000 册

版 次: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:240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

张立文

近代以来,西学潮水般地涌进,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,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,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。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,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。罗素说:“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。”<sup>①</sup>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,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。

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、接纳、引进西学的过程中,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,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。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: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、立场观点、价值观念、评价标准,以适应西学的需要;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,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,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;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、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;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,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。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,有得必有失,有收获也必有牺牲,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但如何得多失少,收多损少,这便大有讲究。主张学术文化“全盘西化”者,“一边倒”学苏联者,则得少失多;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、国粹主义者,则失少得少,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罗素:《中西文明比较》,胡品清译,《一个自由人的崇拜》,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,第8页。

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,如何得多失少?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。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,在汉代传入中国后,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,展开了“沙门敬不敬王”、“神灭不灭”、“因果有无报应”、以及“空有”、“夷夏”、“化胡”等辩论。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<sup>①</sup>的简单拒斥方法,而柳宗元主张“统合儒释”,出入佛道。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:“浮图诚有不可斥者,往往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,……吾之所取者,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,虽圣人复生,不可得而斥也。”<sup>②</sup>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、释、道三教的态度:一是以平等、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,不扬此薄彼,或尊彼卑此;二是出入儒、释、道三教,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,既悉其本真,又知其长短;三是在出入儒、释、道之中,明三教冲突之所在,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。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,所以不能排斥冲突,而应融合冲突;四是吾所取于佛、道者,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。换言之,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,以《易》、《论语》为“取”的标准,不是以佛、道为“取”的标准,即取佛、道以合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,而不是相反,从而在“统合儒释”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。

韩、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、态度及其“取”法,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。宋初一派以“夷夏”、“费财”之辩拒斥佛教;另一派出入佛道,无论是张载、二程,还是朱熹、陆九渊、王守仁,都累年尽究佛、老之说,而后反求诸《六经》,终于在儒、释、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,即宋明理学。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,粗暴的批判,取缔的暴力,激烈的拒斥,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、学说、理念对于人的思维、心灵的渗透和影响。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,焚毁经卷,没收庙产的做法,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。在唐代,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、道有很好的交往,以至相

① 韩愈:《原道》,《韩昌黎集》卷Ⅱ,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。

② 柳宗元:《送僧浩初序》,《柳宗元集》卷25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673—674页。

信佛、道,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,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。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的统合儒、释、道三教之学者,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、释、道三教道路,出入佛老,反诸《四书》,和合转生,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、新思维、新理论。

在当今中、西、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,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,开创了学术的春天,营造了生动活泼、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,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,鼓励大胆探索,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,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,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,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,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。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,中、西、马学术文化的冲突、融合,而迸发出智慧之光,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、马学术文化中,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;西、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,成为中国化的西、马学术文化。中、西、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,生生不息。

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,还是西、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,都应从创新出发,立足于创新,落实于创新,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。我们“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、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,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”;我们要“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,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”;我们要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,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,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三个解放”,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、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“三个创新”,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。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“三个创新”,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。

《当代学者人文论丛》便是从这“三个创新”契入,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。他们各自从教育学、中西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政治学、伦理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、逻辑学、新闻学、语言

学、科学等多视角、多层面探索问题。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,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,提出种种化解之道。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,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。在融突“古今中西”学术文化中,尊重知识,尊重人品,尊重人才,尊重创新,提倡不同学术观点、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,那末实现“三个创新”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。

是为序。

2004.4.6

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作为作家的王朔…………… ( 1 )

作为作家的王朔——首开卖文之先河,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、角色功能及文化人格——通过塑造一系列被称为“顽主”“痞子”的形象,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,使文学大踏步地走向感性化、世俗化——运用口语进行写作,成功地拓展了新时期小说的语言技巧——王朔的成功源于他独特的创作理念与独行的文学行为——王朔的成功也源于时代赋予的创作氛围。

## 第二章 作为文化批评者的王朔…………… ( 37 )

作为文化批评者的王朔——立足于自己的创作进行文化批评,批评与创作相得益彰,双向互动——依附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,发出真实的自己的声音,出语有巧劲狠劲,使批评更切近批评的本义——将文学批评融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中,成功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空间和视野,并对批评文体的创新作了有益的探索,使批评获得新的活力。

##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文化现象——王朔争鸣录…………… ( 65 )

王朔因为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掀起的一场场轩然大波,而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最热情的吹捧和最猛烈的攻击——尤其是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,简直是象征一个时代的重要事件——王朔争鸣中可以显示出社会接受王朔



时所表现出的相当的差异,也可折射出论者的不同心态——这场旷日持久的争鸣有四大特征。

#### 第四章 穿越时空的王朔——王朔存在的意义 …………… (103)

王朔不是一个单个的存在,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代文学史、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王朔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独树一帜的作品,也不仅在于他开拓性的人生哲学和文学行为,更在于他所带来的时代启示——文学新生命的诞生,正在那里焦急地期待确认,要善待作者——文学要生活化——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——文学必然市场化——文学需要出版家——要敢于承认批评多元化的现实。

#### 第五章 王朔猜想——守望王朔 …………… (146)

王朔在当代文坛占据着一个无法替代的位置,无疑能被列入成功者的行列。未来的王朔也应该是示范者和诱惑者——他应该继续与影视联姻,将小说演绎出新价值——更应该转换创作视角,转变认知领域,塑造出新的系列人物,推出关注现实的力作——还应该寻找到新的切入点,继续撰写批评著作。

####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…………… (179)

#### 后记 …………… (181)

## 第一章 作为作家的王朔

王朔对中国当代文坛,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,作为作家,他获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。

1978年,刚刚20岁的王朔,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《等待》。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少年在阴云笼罩之下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得,只能在枯燥和单调的日子里等待“四人帮”早日覆灭,等待欢乐的日子早日到来。尽管,这在当时,是很普遍的文学题材,对作者和与他同龄的作品女主人公来说,他们对时代的感知,因为年龄关系,毕竟还无法深入体察,更无法转换为深刻的感情和文字。但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练笔之作,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起步,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。要知道,1978年的王朔正在北海舰队服役,一个兵能在自己部队的杂志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小说,该是一件多荣耀的事!此后,王朔又发表了两个短篇:《海鸥的故事》(1982年)和《长长的鱼线》(1984年)。前者讲述一位热爱自然、充满爱心的老人怎样保护海鸥的故事,后者写的是海军战士和一小男孩纯真、质朴的友谊。这两部作品虽故事设置简单粗糙、语言平淡。但那时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,有多少人藉文学之力,一举成名,多少新作在读者中间不胫而走,文学的吸引力,以此为甚。所以,这两个短篇可算是王朔的一次成功的投石问路。

1984年,王朔凭着自己审时度势的聪明,以及独特的叙事风格,清新流畅的文笔和机智幽默的人物语言,在《当代》上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《空中小姐》,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广大读者,也引起文坛注意,使他争得了当年《当代》新人新作奖,并随后被改编为电视剧。从此,王朔有了良好的开端,并达到预期目的。那年,他26岁。事后,王朔自

白：

我知道什么好卖。当时我选了《空中小姐》，我可以不写这篇，但这个题目，空中小姐这个职业，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。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。果不其然，我不认识《当代》的编辑，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。我要是写一个老农民，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。<sup>①</sup>

1985年，《浮出海面》发表。1986年，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发表。至此，王朔的“日子好过了一些，手头渐渐宽裕，人也渐渐扬眉吐气”。<sup>②</sup>王朔开始名利双收，实现当初谋求生存的最初愿望。

1986年至1992年是王朔创作的丰产阶段，他写了《橡皮人》《顽主》《玩的就是心跳》《过把瘾就死》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《我是你爸爸》等二十几部长、中篇小说，以及《渴望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《爱你没商量》等数十集电视剧。1988年，王朔的四部作品同时被搬上银幕，米家山执导《顽主》、黄建新执导《轮回》（《浮出海面》）、叶大鹰执导《大喘气》（《橡皮人》）、夏纳执导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，引起极大反响，这一年被电影界称为“王朔年”。电影界的“王朔年”为他的作品做了很好的广告，而电视的魔力则更大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播出使王朔真正红了起来。电视的宣传作用不仅使王朔成为一些青年人的精神偶像，也在客观上为其作品提供了一个精美的包装。王朔迅速成为大江南北、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人们争相抢购和传阅他的书，他得到了只有文坛泰斗们才能享有的殊荣——出版文集。

四卷本《王朔文集》自1992年出版以来，多次重印，成为图书市场的一次又一次大卖点。这套文集至2002年，改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王朔本人补写了《2002年版文集自序》。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《王朔文集》，在原来的四卷本基础上再加上四卷：《篇外篇》《橡皮人》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《随笔集》。2004年，中国电影出版社又

① 王朔：《无知者无畏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0页。

② 王朔：《我是王朔》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1992年，第23页。

推出六卷本王朔小说集，冠名为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彩图珍藏版，印刷装帧堪称一流，摆在书店里自然能吸引许多眼球。时序更迭，翻拣旧往，披沙拣金，尽管是新瓶旧酒，但王朔的作品依旧红火有卖点。

1998年，沉寂了六年后的王朔再度“咸鱼翻身”，此后，他几乎是每年爆一个甚至几个冷门，总是在人们快将他遗忘的时候，他便登场了。1998年出版小说《看上去很美》，一本他最心疼，简直是用最美丽的生命去酝酿的作品；1999年底，一篇《我看金庸》，以口无遮拦式的批评，掀起了一场文坛之争；2000年1月，他趁热打铁，出版专著《无知者无畏》，于2000年3月又发表《我看鲁迅》，以他的叛逆与偏激又一次惹起了传统学者的恼怒。又与冯小刚合作，以一部《一声叹息》引发国人深思。2000年8月出版《美人赠我蒙汗药》；2001年，他建起了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；2002年，改编《过把瘾就死》为电影《我爱你》。

不可否认，作为作家的王朔，不仅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者，也是一个突破者，在中国文学中，王朔有其独特的贡献。

### 贡献之一：开创卖文之先河，彻底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、角色功能和文化人格。

有人趣说，20世纪80年代的求爱方式是半路拦住一个姑娘，问“喜欢文学吗？”恋人们第一次见面的接头暗号往往是手持一本文学名著。那时候，文学是一个耀眼的光环，文学青年是一个光荣的身份，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敬语，它包含了当事人本身的价值追求及外界对他的认可。这和当时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有关。然而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大多作家、文艺家都饱受着来自物质、金钱方面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，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。在市场经济对文学生存发展的裹挟下，放弃文学理想和操守的人属于少数，更多的作家、文艺家则在探索着、思考着，并积极寻找文学得以变革发展的新坐标。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，重新确立自身符合历史要求的角色定位，在文学的审美视界、价值取向和写作方式方面进行了颇为悲壮的凤凰涅槃般

的再生历程。面对无可否认的文学脱离政治中心话语的事实，困惑和彷徨的心境油然而生，甚至连自己今天在哪里、将走向何方也变得极不确定。于是，失落的强烈感受与理想的朦胧常常泛上心头，他们急切地寻找着一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参照物，此时此刻，王朔出现并崛起了。

王朔是首批出现的“文化个体户”之一，成了中国作家协会 5000 余名会员之中，继巴金以后靠自己稿酬生存的惟一的一位文化个体户，他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醒者。他毅然辞去公职，放弃“大锅饭”，坚定地走向以卖文为生的道路。他带头组建文学商业团体“海马影视创作中心”，公然宣称谁要戏就给谁写。他率先给自己的作品开价，要求分享作品给电视台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。他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作家传统的生存方式、角色功能和文化人格。

王朔给文坛带来的，是一股浓郁的商业时代的气息。从 70 年代末期起，当代汉语的辞典里，出现了一个新词——个体户，新的时代带来新的机会。在计划经济的缝隙处，冒出了新的经济形式的嫩芽，一群敢于吃螃蟹或者敢于铤而走险的人们，一群无法争得一个国有或者集体经济的“铁饭碗”或者不满足于这“铁饭碗”所得的人们，开始了新的冒险，摆摊设点，倒买倒卖，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，逐渐地成长起来。它的正式名称叫“个体经济”，从业者则被称为“个体户”。王朔，则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个体户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中，作家被纳入社会的整体框架里，是领取工资而不是靠稿费生存的，他无论写作的业绩如何，都有一份基本的工资收入，有一只“铁饭锅”。这种由国家把作家统统养起来的方式，在遴选和管理作家等方面，在激发文学的生产力方面，其弊病自不待言。王朔从一个文学青年、业余作者，到断然辞去公职，以写作为生，把文学创作完全投入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中去，可以说是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活法，一种置身于体制之外，虽然不无饥馁之虞，却自有其独立不羁的风度的新活法。王朔坦言：

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作家是个高尚的职业，不能谈钱。其实，对电视剧而言，我觉得剧本价格的增长应与制作成本的增长成正比关系，因为

它对剧本的依赖超过对演员的依赖。在这种情况下,作者付出的劳动要超过演员,当然应该多得钱。我觉得这特正常,因为我没见到任何一个行业有只干活不要钱的。

金钱就跟女人一样,本身并不肮脏,就看你怎么用。说你拿了钱灵魂必然会堕落,我觉得没这必然关系。我们常常把金钱视作万恶之源,我想这恐怕是知识分子故意制造出来的吓人的神话吧!<sup>①</sup>

一个作家如此将自己商品化当然会引起许多质疑和贬责。如果王朔没有昏头的话,他也应该理解社会对他的反应。他的做法前无古人,太惊世骇俗了。王朔的出现,昭示了作家他可以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:人格多伟大,道德多完善,行为多文明,是人类的楷模,灵魂的工程师。作家没必要有那么高的境界。他把“文字”的价格炒了上去。“买”“卖”双方商讨稿价。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的稿酬标准,从“死要面子”到公开议价,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。作家们由此开始了神态自若地谈钱开价,鱼和熊掌得兼的局面不再是不可能的了。

1990年,王朔的小说《过把瘾就死》单行本印数30万册,1992年,《王朔文集》在一片沸沸扬扬的争议中销了40多万套,加盗版的达到100多万套。1992年,他的图书销售已应声而涨,每本均破10万大关,且持续节节上升。那年年底,王朔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的脸,对自己说:你小子算混出来了。再来看看1998年的那本《看上去很美》的销售过程。在图书订货会上,他的书没有名字,听说当时这个《×××××》就获得了20万的订量,这个数字看上去是很美,虽然只是新语丝记者的一半。在书的印刷上也颇有奇招,像我们以前读书时为了保护课本,就用牛皮纸或者挂历纸作为书皮一样,《看上去很美》一书的书皮用牛皮纸表演了包课本的最高手艺,包得蛮复杂的,还留了一个口袋,用来夹一张随书而送的CD-ROM,看上去很牛。这个光盘里面是王朔过去作品的自选集,虽然只有大概5MB左右的容量,

<sup>①</sup> 葛继宏:《叩访名家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1997年,第64页。

但是因为都是文本储存,信息量倒是不少,整整有十篇小说。书加光盘一共只卖 23 块,看上去很便宜,而利润自然是丰厚的。当年,写小说 30 元左右 1 千字。王朔的小说出版社愿意出高价,版税为 12%,而影视剧本的价码是多少?电影剧本的稿酬一般是 1—2 万元,多的 10 万元,电视剧本上税后每集 2500 元,写 10 集、20 集、甚至 40 集呢?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如《爱你没商量》摄制完后,中央电视台以 350 万元的高价购买其播放权。王朔靠卖文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
由此可见,与其说王朔是通过他的作品在文坛上走红,不如说他是通过对文学商品化的积极努力这一经济性行为,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,在文坛上造成轰动效应的。尽管,文学是特殊的商品,不可用金钱来定位,可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鱼和熊掌得兼呢?

**贡献之二:率先开掘了转型期新兴的市民阶层资源,通过塑造一系列这个阶层的典型形象,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,使文学大踏步地走向感性化、世俗化。**

是王朔在小说中率先开掘了转型期新兴的市民阶层资源,为此,他塑造了一系列这个阶层的典型。然而,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,因为市民意识被戴上庸俗功利、玩世不恭、享乐至上,王朔笔下的人物也被简单地划称为“痞子”“顽主”,他的小说被简单地定性为“痞子文学”,认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话语和启蒙话语的痛快淋漓的颠覆而已。

中国的文学批评历来崇尚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,作家是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理论早已耳熟能详,作家们实际上也确认了自己的知识、审美品质、道德力量、精神境界、政治自觉均是高于一般读者的。他们更承认自己的任务、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、推到、煽动到、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。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,那至少得在运笔的瞬间“升华”到高境界来。于是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,阅读

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。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真、善、美。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与审美的理想，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，能照亮人间，那是作者的深思与人格力量，也是时代的“制高点”所发射出来的光辉。

可惜，现实是残酷的，作家也得躲避崇高，<sup>①</sup>事实上，要让作家们的“铁肩”来担“道义”也真有些勉为其难。正好，此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王朔，他为作者和读者打开了一扇窥视现实的新窗户，那就是他塑造的一系列被批评界称之为“痞子”“顽主”的形象。

“痞子”“顽主”们以迥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社会和他人拉开了距离，也因此获得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。他们行踪飘忽、浪迹南北，出入宾馆饭店、沙龙舞厅，通宵达旦地追求刺激，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提供的奢华生活。他们在追求一种物质享受的同时，还表现为追求一种人生自由和精神快乐。他们以玩世不恭、纵情声色的生活行为，喧嚣骚动的生存心态一反传统市民循规蹈矩和谐安定的生存方式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市民中最底层人物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有的还有种种作案前科。他们百无聊赖，蔑视工作、学习、婚姻、家庭、道德等一切规范和秩序，整天出入客厅、餐厅和舞厅、情场和赌场，怎么玩得心跳就怎么玩，“一点儿正经也没有”。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可以用一个“玩”字来概括，就是“玩人生”，及时行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他们是都市不安分的魂灵。时代赋予他们怀疑的性格和叛逆精神。他们始终骚动着，像笼中的兽，左冲右突，要挣脱一切束缚，冲决一切樊篱，大胆而勇猛地践踏社会规范和秩序，呈现出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。他们对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的藐视和践踏，呈现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生龙活虎的生命冲力。尽管，由于新的规范与准则尚未建立起来，他们无所依循，无所规范，但在他们心目中并非无所依循，而这种依循和自我确立的准则又是与社会规范相悖的。他们的行为便构成了同社会的对立，这种对立时而闪现生命意识的光

<sup>①</sup> 王蒙：《躲避崇高》《读书》1993年第1期。



芒和自我的确立以及个性的张扬,但总体上却是极个人主义的扩张。他们作为经济上独立的无职业人士,已不再是通常意义的“个体户”。他们在事业上没有奢求,经济上很宽裕,除了偶而触犯“规则”外,小心翼翼地并不触犯法律,在有限的范围内恣意妄为。但是,也正因为“局外人”“边缘人”的缘故,他们始终难以在社会和生活中定位,况且他们仅仅是处于边缘,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和生活。他们要为自身的生存寻求途径,而且其目的、手段有时和常人并无不同,这样就必然同社会接触、磨擦以至碰撞,这样就派生出种种烦恼和痛苦,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回避。对社会的失望像阴影一样笼罩他们,使其骚动不安而焦灼苦闷。社会现实种种不能尽如人意之处被他们感知并被无限度地夸大了,自觉无力改变又要生存下去,所以他们生活在无奈之中。对现世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渺茫,使他们极尽对政治的淡漠厌恶和对文学的亵渎嘲讽。<sup>①</sup>

环顾生活四周,不难发现,王朔描写的这一市民阶层经过十多年的孕育和发展,依托文化市场,已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层。新时期现代化转型的过程,就是与市场经济大潮相伴随的城市化、世俗化的过程以及市民社会、市民意识的崛起过程。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,市民已开始大步跃上社会舞台。与之相适应的,他们也必然要求在文学文化上表达自己的声音,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这种要求在其起初,总是以对既有文学文化的破坏消解为先导。王朔作品的出现,从80年代的反响中一直到90年代的风靡一时,正反映了在时代变动条件下这一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的客观事实。王朔的读者群中,青年人占极大的比重,处于改革大潮中的他们与作品中的人物有着相似的生活遭遇、命运处境、思想感情,他们从作品中寻找自己、发现自己,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。

从理论上说,只有取得了文学价值的时代性,才有可能具有长久的历史性。文学价值的创造是不能脱离时代,不能脱离特定时代的社会,

<sup>①</sup> 常清华:《论王朔的“顽主世界”》《中国现代、当代文学研究》1991年第9期。